论我国革命

读者来稿

论我国革命

November 23, 2021

论我国革命

读者来稿
我认为列宁道路将我国革命现阶段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相当准确的。在接下来，我想具体讨论我国革命的性质和一般策略。

首先，我认为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同于诸如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列宁道路所说“自由派资产阶级无力进行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再次表明自己由于畏惧激烈斗争躲在法西斯主义的羽翼之下”。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大于革命性，因此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承担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担。

其次，我将区分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是推翻专制政府，建立革命民主政府。由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组织力量的不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左中右三种结果。第一种是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民主政府。第二种是出现了工农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存的局面。第三种可能是政权完全落入资产阶级手中。这三种可能最后都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第一种可能之下由于政权已经被无产阶级掌握，因此可以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后两种可能之下，如果我们善于利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会给无产阶级政党创造出进行大规模组织和鼓动的机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前提条件。最终将通过一次新的“十月革命”来完成这一过程。

我国在当下只能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两种革命的性质和目标不同决定了革命采取的策略不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应该领导和团结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部分同情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绝不放弃对工人阶级进行充分政治教育的任务，以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迅速向社会主义革命进发。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最常犯的是“左”和右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右的，例如历史上王明所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当然应该建立最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但同时应该保证自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证自己相对于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保证自己具有充分对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鼓动的自由。

第二种策略是“左”的，即毛泽东所说的“关门主义”。这种观点反对建立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拒之于革命大门之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具有共同的革命目标。随着经济危机加深，大批小资产阶级破产，进入到无产阶级阵营中。这些小资产阶级对垄断资产阶级充满怨恨，但又苦于找不到革命的道路。正如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代表人物许志永在法庭上所说：“如果我的改良主义主张不被接受，那么中国未来将会出现革命”（大意如此）。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时期，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由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突出体现在对历史上文革的妖魔化和恐惧）会采取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突出表现是2000-2012年这一段时期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广受欢迎。

但是，当特色政权加速法西斯化，改良主义的空间被扼杀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一部分自由派资产阶级会转向革命立场。香港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勇武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和理非）即在2014年改良主义的“占领中环”失败之后，急剧激进化，采纳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口号，进行了从2019年至2020年失败的香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香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处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意识形态和组织领导之下，而不是反过来，而这又是缘于香港独特的国际位置和阶级结构。因此，香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它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无力完成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

在当下，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既具有深刻的革命性，也具有深刻的动摇性。革命性如前文所示，动摇性体现在当大规模革命运动爆发之后（例如1905年俄国革命），专制政府为拯救其统治，必然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改良措施。例如召开国家杜马，和人民“分权”，同时坚决镇压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见的是大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会跑步进入杜马，进入专制政府，放弃民主革命任务。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加入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给先锋队带来了新的理论和认识，壮大了先锋队的力量，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投机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错误路线。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阶段既不应该拒绝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加入先锋队（当然，要视其觉悟程度而定），也不应该放弃在党内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展开路线斗争。